

報告11 上京址考古与研究新展

| | |
|-------|---|
| メタデータ | 言語: zh-cn 出版者: 公開日: 2024-06-25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汪, 盈, 董, 新林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
| URL | https://tohoku-gakuin.repo.nii.ac.jp/records/2000286 |

報告 11 辽上京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新进展

汪盈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辽代是由契丹民族创建、汉人占多数的多民族王朝。长期占据北中国历史舞台的辽朝与南中国的五代北宋形成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辽代的政治理念和都城制度都对后世，尤其是对金、元、清三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辽代都城考古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辽代一共建有五京，其中，辽上京是辽代五京中营建最早、地位最为重要的都城。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辽上京城址由皇城和汉城南、北二城并列组成，总面积约 5 平方千米。皇城是契丹统治者和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居住之所，汉城主要分布汉人、渤海和回鹘人等其他民族的民居、作坊和馆驿等。位于北部的皇城遗址保存较好，平面近方形（图一）。四面皇城墙地表遗迹保存较好，城墙由夯土筑成，一般高出地面 6~9 米。城墙上间隔设置凸出城墙的马面，城墙外有壕沟。



图一 辽上京皇城遗址全景

1961 年，辽上京遗址被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老一辈学者的考古工作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自 2011 年开始对辽上京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十余年来，通过对辽上京皇城的城墙、城门、道路、水系、宫殿、佛寺等重要遗址进



图二 辽上京遗址平面图

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在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新进展（图二）。主要从宫城四至范围、宫城皇城朝向和皇城西山坡遗址三个方面归纳如下。

一、辽上京宫城四至范围的考古学确认

（一）宫城城墙

《辽史》记载，辽上京“其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¹。这条文献明确记载了辽上京皇城内建有宫城，称为“大内”，且宫城设有南、东、西三座城门。以往的考古勘探工作，曾初步探出宫城北墙和西墙的可能走向，但对南墙和东墙几乎没有线索。宫城的准确范围一直都不清楚。自2014年至2016年，我们开始对宫城城墙进行重点勘

¹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探，同时对四面宫城城墙的关键地点进行考古试掘，并分别对宫城城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力求从多方面确认和验证宫城的四至范围、形制布局和使用时代。四面城墙中仅宫城北墙略存地表遗迹，北墙夯土现存残长约610米；西墙夯土残长约780米；南墙虽地表破坏严重，但整体格局保存较为完整，总长约760米；东墙夯土残长约480米。其中宫城的西墙北段、北墙东段、东墙北段破坏较为严重。



图三 宫城北墙夯土剖面

考古试掘所见的宫城北墙和西墙形制基本相同。墙体由夯土主墙和两侧的附属堆积组成（图三）。主墙为深黄色夯土。截面呈梯形，底宽2.5-2.9米，残高0.3-1.4米。夯层较规整，厚0.13-0.18米。主墙基槽开口大致与墙身底部等宽，截面呈不规整梯形，深0.2-0.3米，由黄、灰色夯土相间夯筑2-3层而成。夯层不规整，厚0.06-0.17米不均。主墙内外两侧均有补筑的夯土附属堆积，保存情况较差。墙内侧夯土残宽1.6-2.5米，残高0.2-0.9米。局部宽至8.6米，可能有多次补筑的特殊设施。墙外侧夯土似紧贴主墙略下基槽，然后补筑。槽宽约3.2米，地面以上夯土破坏较严重，残高0.3-0.5米。根据两侧夯土的残存高度多低于主墙，且局部夯层有倾斜现象推定，该附属堆积应为类似墙体护坡的性质。通过对宫城北墙的解剖，还揭露出宫墙夯土侧壁上等距分布的立柱痕，和在夯土底部等距分布的小柱坑等与宫墙营建工程相关的重要遗迹。



图四 宫城南墙夯土剖面

宫城南墙和东墙形制基本一致，但与西墙、北墙有所不同(图四)。夯土主墙两侧多被晚期遗迹叠压破坏，残存底宽6-6.85米，残高1.1-2米。墙体为灰褐色夯土，夹杂白灰粒、黄土块等，包含少量陶片、瓷片、瓦片、白灰块、兽骨等遗物。夯层较规整，厚0.09-0.12米。可见清晰夯窝，呈椭圆形，直径0.05-0.08米。在夯土主墙内，还发现平行于墙体方向的木痕圆洞，直径0.12-0.15米，应为柃木痕迹。夯土基槽打破生土。基槽南侧均被破坏，从北侧看略窄于墙身。开口残宽5.9-6.4米，深度约0.5-1.1米。基槽为深灰褐色夯土，包含较多砖块、瓦片、白灰块、炭粒、陶片、瓷片、兽骨等。夯层不规整，厚0.06-0.25米不等。墙基两侧筑有夯土护坡等附属设施。

根据试掘，宫城北墙外侧局部、北距墙体4.5米发现平行于宫墙的壕沟遗迹。壕沟断面略呈倒梯形，上口宽2-2.4米，下口宽0.3-0.33米，深约1米。宫城南墙外侧局部、南距墙体约0.5-0.6米处，也发现壕沟遗迹。壕沟打破南墙夯土及其基槽，其形成或晚于南墙的营建。壕沟断面略呈倒梯形，上口宽2.3-2.8米，下口宽0.3米，深1.5-1.7米。宫城西墙外侧遗迹破坏严重，暂未发现壕沟遗迹²。

(二) 宫城城门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12期。



图五 东华门遗址发掘全景

在确认了四面宫城城墙的走向和形制之后，我们继续对宫城东门、南门和西门三座城门进行了考古发掘。

宫城东门（东华门）遗址位于宫城东墙中部，与皇城东门相对。东华门是一座三门道殿堂式城门，区别于辽上京其他城门均为过梁式城门，显示了这座城门重于礼仪的特点。东华门遗址保存较差，仅存夯土台基的基槽和柱下礅墩部分（图五）。基槽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面阔约 32 米，东西进深约 13 米。根据礅墩的分布可确认，殿堂式城门的柱网平面为面阔五间，进深两间的分心槽布局。根据平面形制和台基外的坡道残迹推测，辽代东华门为三门道城门。该门址在金代已完全毁弃³。

宫城南门（承天门）遗址位于宫城南墙中部。承天门遗址至少有两次大规模营建，时代均为辽代。第一次为辽代早期始建，仅在城墙上开设门道，未见墩台；第二次营建时增设墩台和马道。第二次营建直至毁弃的承天门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由东、西两侧的墩台、中间的单门道和登临墩台的内侧（北侧）马道三部分组成（图六）。已揭露的西墩台东西面阔 6.65 米，南北进深 11.8 米。墩台各面边壁做法有多次改建，从涂抹黄泥、到涂抹白灰皮，再改为底部土衬石上部包砖。中央设单门道，宽约 7.8 米。原位保存有将军石、石门限和门砧石等设施。门道两侧的城门木构基础做法为石柱础上铺木地袱，上立排叉柱。石柱础每侧 6 个。该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 年 6 期。



图六 承天门遗址发掘全景

门址在金代已完全毁弃⁴。

宫城西门（西华门）遗址位于宫城西墙中部，与皇城西门相对。西华门遗址至少有两次大规模营建，时代均为辽代。整体形制结构和宫城南门承天门一致。经发掘，毁弃之前的西华门为单门道过梁式门址，门道宽度约 6.4 米（图七）。该门址在金代已完全毁弃⁵。

通过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我们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更正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平面呈近方形，东西宽约 760 米，南北长约 780 米，总面积约占皇城面积的五分之一。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四面宫城城墙始建于辽代，到金代逐渐遭到破坏，直至毁弃。从已揭露的数处探沟可见，有较多的小型房址、灰坑等金代遗迹叠压或打破辽代宫城墙及其废弃堆积。这表明辽上京城址虽然在金代仍然沿用，但是宫城城墙已经完全废弃，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二、辽上京皇城和宫城朝向的考古学证实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 年 5 期。

⁵ 董新林等《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 年 1 月 30 日第八版。



图七 西华门遗址发掘全景

确认辽上京宫城的四至范围之后，皇城和宫城的朝向和主要建置的形制布局成为辽上京都城考古研究的首要重点课题。我们从主要城门、主要街道和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一）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

《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共有四座城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⁶其中，皇城南城门已被河水冲毁，其余三座门址尚存。2011年和2015年，我们分别对皇城西门和东门进行了考古发掘或试掘。

皇城东门（安东门）遗址位于皇城东墙中部，城门外建有瓮城。经考古试掘，辽代安东门为三门道过梁式城门。其中，中门道破坏严重，南、北两个门道保存较好。门道两侧残存门道木构基础，辽代最后一次营建的做法为土衬石承木地袱立排叉柱。金代对南、北两门道进行封堵，安东门改为单门道城门⁷。

皇城西门（乾德门）遗址位于皇城西墙中部。城门外建有马蹄形瓮城，瓮城门向南开设。经考古发掘，辽、金两代乾德门均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图八）。城门有三次大规模营建，第一次和第二次为辽代，第三次为金代。第二次营建的辽代乾德门遗址保存较为完好。门道宽约6.2米，门道两侧尚存较为完整的土衬石，

⁶ 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⁷ 董新林等《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八版。



图八 乾德门遗址发掘全景

其上残存木地袱遗痕，可辨认木地袱上残有卯口，内有排叉柱木痕。土衬石下做深约3米的夯土基槽。金代改建的乾德门墩台体量变小，门道缩窄，仍为单门道城门⁸。

（二）主要街道遗址的考古试掘

根据考古勘探，皇城东门大街东端与皇城东门相连，西端与宫城东门相连，是东向轴线上的主要街道。经试掘，该街道现存3次主要营建。第一次营建是在生土之上，局部用灰褐色碎砂石土做垫土，路面残宽43.5米。第二次营建路面大部分沿用早期路面，局部垫土，形成新路面。路面残宽约40米。第三次营建路面沿用了前两次的路面，局部修整形成灰褐色砂石路面。皇城东门大街是辽上京皇城内目前所见最宽的街道。

皇城南门大街位于皇城南部，北端抵宫城南门，南端被沙里河洪水破坏，原应与皇城南门相接，是皇城内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经试掘，发现该街道共存路面遗迹15层及与各路面相对应的临街建筑址。根据层位关系，结合遗迹和遗物的整体变化，可将一号街道及临街建筑的营建从早到晚分为五段，反映了辽金时期的道路沿革情况。其中，辽代路面宽度约17-18米⁹。

⁸ 董新林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八版。

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一号街道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11期。

（三）宫城主要殿址的考古发掘

宫城内的建筑基址主要分布于宫城中部、宫城东南部和西北部。从地表遗迹看，既有东向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及围合院落，也有南向的排房式建筑群。经考古发掘，地表遗存包括辽、金两代不同时期的营建。目前发掘所见的辽代宫城内的大型殿址及其院落均为东向，南向建筑为金代始建。

宫城一号殿及院落坐西朝东，位于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构成的东向轴线上。一号院落平面呈长方形，四面均以廊庑围合，东面中央设门，西面正中为一号殿址。通过局部揭露可知，一号殿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 48 米，东西宽约 27 米，台基四壁包砖。一号院廊庑发现四排礲墩，进深三间。

宫城二号院坐西朝东，位于一号院的西侧。二号院保存较差，对南廊东端进行试掘，发现四排礲墩，进深三间。



图九 2019 年大型殿址发掘全景

2019 年对宫城中北部大型殿址进行考古发掘。该殿址有辽、金两次大规模建设，辽金建筑的朝向和形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辽代殿址坐西朝东。夯土台基平面近方形，边长约 51 米，东侧中部设月台。殿身面阔九间、进深八间，副阶周匝（图九）。金代重建的殿址改为南向建筑，但仍沿用了辽代的台基夯土，重新包砌青砖。殿身坐北朝南，东西面阔约 19.6、南北进深 17 米，南侧设五瓣蝉翅慢道¹⁰。

¹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建筑基址 201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 年 8 期。

宫城西北部地表现存一处南向的地势较高的建筑群，由有十座南向的排房式建筑基址排列组成。2018年进行考古发掘，确认单座排房建筑平面为长方形，房屋四面建有夯土墙。室内设两道隔墙，将房屋分为东间、中间和西间三部分。每个隔间面阔5间、进深3间。均于当心间设门，门前为三瓣蝉翅慢道。发掘确认，该建筑基址有两次大规模营建，时代均为金代。排房建筑址下还叠压着更早的辽代殿址，辽代殿址及其院落的朝向均为东向。

综合以上考古发掘资料，首先，从城门来看，辽上京皇城东门为三门道过梁式城门，而皇城西门、北门均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辽上京宫城东门为三门道殿堂式城门，而宫城南门、西门均为单门道过梁式城门。可知在皇城、宫城中，东向城门规模大、等级高，是辽上京皇城、宫城的正门，是体现都城规制的礼仪之门。其次，在主要街道方面，连接两座三门道城门的皇城东门大街，试掘所见在辽代的道路宽度不少于40米；而皇城南门内大街宽度仅为20米左右。更重要的是，皇城东门、皇城东门大街和宫城东门所形成的东向轴线向东延伸到宫城东门之内，发现多座大规模的东向宫殿建筑及院落沿轴线对称分布；然而在宫城南门和皇城南门大街所形成的南向轴线上，到宫城南门之内，只见继续向北延伸的道路，却未见大型建筑分布。考古发掘确认，宫城西北角现存地表保存较好、地势较高的南向建筑院落，其时代是始建于金代。其下叠压的辽代建筑及院落仍为东向。由此可以证实，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朝向为东向。

三、皇城西山坡遗址的考古发掘



图一〇 西山坡遗址北院三座塔基发掘全景

西山坡遗址是位于辽上京皇城西部地势高点的一处规模宏大的东向建筑群。西山坡遗址的建筑时代和建筑性质是辽上京城址研究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根据地表遗迹，西山坡遗址由多路东向的建筑院落组成。其核心建筑位于西山坡制高点，可分为北院和南院；两侧还有附属院落。

2012 年对北院的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确认为三座六角形塔基，并对北院院落布局进行试掘¹¹。北院建筑以佛塔为中心。三座六角形塔基位于院落后部，一大两小，一字型对称分布（图一〇）。中央大塔编号为一号塔基，南、北两座小塔编号为二号、三号塔基。一号塔基为一座辽金时期的六角形砖构木回廊楼阁塔，台基对径约 40 米。共有外、中、内三圈柱网，每面面阔三间。外、中圈柱网组成木构回廊，内圈柱网内为砖构塔筒。木构回廊内残存铺砖地面，出土大量泥塑倒塌堆积，其中有几尊泥塑像保存较为完好（图一一）。砖构塔筒内设双向楼梯，可供登临。一号塔基建筑位置重要，建筑规模庞大，塔身和夯土台基的残存遗迹现象复杂，建筑形制结构独特，出土大量泥塑造像，和以往所发现的该时期塔基不尽相同，是辽代佛塔营建的新资料。



图一一 西山坡遗址一号塔基出土泥塑像

¹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 年 1 期。

二号、三号塔基的台基底边对径分别为 11.8 米和 11.4 米。两座小塔保存情况很差，几乎仅存夯土台基和地宫土圻。幸运的是，在三号塔基的填土中发现一件彩绘石雕舍利棺残件，确认塔基地宫内曾以舍利棺瘞葬舍利。

南院建筑以佛殿为中心。从东至西，依次布局山门、中殿和后殿，两侧有廊庑围合。2020 年-2021 年对南院的山门、中殿、后殿及两侧配殿及廊庑、角楼等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或试掘，可知南院的诸座建筑均始建于辽代，经过长期使用和多次改建，一直到金代晚期废弃¹²。

皇城西山坡遗址的考古发掘，对认识辽上京城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西山坡佛寺位于皇城西部的制高点，规模庞大，具有重要的等级地位。寺院朝向与皇城朝向一致，均为东向。寺院的核心建置呈现塔殿并重的格局，此外在南院、北院的南北两侧，还有地势较低的东向附属院落；多进院落可能同用墙体围合，组成规模庞大的西山坡佛寺。西山坡佛寺时代和性质的确认，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布局的认识。经发掘，西山坡佛寺北院、南院及两侧附属院落的数座建筑基址都是辽金两代、多次营建重叠的复杂遗迹。时代为辽代始建，沿用到金代。虽单体建筑的形制结构有所变化，但寺院始终为东向，建筑格局和建筑性质始终未变。这些都反映了辽、金两代城址布局和佛寺布局的沿革情况。一号塔基是辽金时期少见的砖构木回廊结构实例，增进了对辽金时期建筑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塔基出土泥塑像制作工艺高超，是经考古发掘出土的保存较为完好的辽金时期泥塑像。这些都为我们了解辽金时期的城市、建筑、佛教、艺术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四、考古发现所见的辽上京城址的布局与沿革

综合以上辽上京城址考古的发掘发现，结合文献资料，我们对城址布局和沿革的主要认识小结如下。

在辽上京城址布局方面，第一，对辽上京宫城四至范围进行了考古学确认；第二，从皇城宫城城门、主要街道和宫城轴线建筑等几方面的考古发掘证明，辽上京皇城、宫城在辽代的朝向为东向；第三，辽上京皇城西山坡遗址为大规模东向的皇家寺院，整体格局为塔殿并列布局。

在辽上京城址沿革方面，第一，辽上京在辽代作为都城期间，虽然各处建筑单体的形制结构皆有所重建，但是主要宫殿、街道、城墙、佛寺等建筑规制一直延续，皇城和宫城也一直继承了辽代始建的东向格局。第二，金代占领上京之后，不再作为都城使用，城址只有皇城城圈继续沿用，皇城内原有的宫城格局完全废弃，重新进行以南向建筑为主的规划建设，城市面貌和格局的巨大改变体现了从都城到地方城的变化。第三，经过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初步建立了辽上京出土遗迹遗物的年代序列，包括城门、殿址这样的建筑遗迹，也包括瓦当、陶瓷器标本等出土遗物，为下一步继续发掘与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基础。

¹² 董新林等《辽上京西山坡遗址 2020 年度考古新成果——辽上京内现知规模最大寺院，呈现塔殿并重格局》，《中国文物报》2021 年 2 月 19 日第八版。